

江苏省教委「编辑出版劳动管理」课题成果

编辑通论

蒋广学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教委“编辑出版劳动管理”课题成果

编辑通论

蒋广学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南京

24
T
E
R

(苏)新登字 011 号

编辑通论

蒋广学 著

责任编辑 王振义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阳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70 千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305-02830-4/G·445

定价 15.00 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序 一

广学同志的新著《编辑通论》，是他 20 多年心血的结晶。书成之后，他要我为它作序，我欣然从命。我很明白，他要我为他的著作写序，主要不是因为我对编辑学有什么研究，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要我与 him 一起分享劳动的愉快。

我原是教哲学的。1986 年学校调我参加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才开始从事编辑工作。起初，我只知道关门办刊，很少跟外界接触。那时虽然做着编辑工作，可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哲学，可以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平时脑子里很少出现编辑学的字样，对于编辑学及其研究的进展情况知之甚少，自然对它也没有什么兴趣。1988 年 7 月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筹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作为筹备组的负责人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全国主要高校的学报同仁，也是第一次闻听到关于编辑学研究的一些情况，跟广学也是这次会议上认识的。在会议报到处第一次见到他，就使我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会议期间他的发言并不多，但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后来研究会成立时推选我做理事长，我就建议他与另外两个同志一起担任副理事长。此后我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就逐渐频繁和深入了。回想起来，我的关于学报工作的很多理论问题，还是从与他交往中以及他为研究会起草的几个文件中获得的。

广学知识面广,才思敏捷;有哲人的智慧,也有诗人的激情;粗犷豪爽似绿林好汉,思维缜密似能工巧匠;有农民的质朴,也有学者的风度,真可谓文质彬彬。交往中我深受他的感染,逐渐对编辑学产生了兴趣,经常阅读一些这方面的论著。在学习和比较中,发现广学对编辑学常有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一方面来自他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的哲学功底。他对于编辑学问题的阐述,总是有哲学的星光闪耀。正是从他的哲学研究中,也基于我对哲学功能的理解,我深深感到编辑学可以也必须与哲学联姻,编辑学家可以也必须与哲学家合作。不借助于哲学,关于编辑学的研究往往只能停留在经验的描述上,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的科学的编辑学。

广学之所以能够在编辑学的研究中取得突出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把哲学作为方法论运用于编辑学。我认为这也是《编辑通论》优于其他编辑学著作的地方。多年来,从事编辑学研究的人很少注意进行方法论方面的反思,以致于一再强调“编辑有学”,却因未拿出一定数量的能被人们承认的、系统的、理论形态的著作,因而始终未能使编辑学取得它应有的地位。这不能不说与从事编辑学研究的人大多还未能自觉地运用哲学的方法论有关。实际上,关于编辑活动的本质、编辑活动的基本矛盾、编辑活动的过程和规律,以及关于编辑学的对象、编辑学的基础、编辑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等许许多多编辑学的基本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哲学所提供的方法论指导。以往人们常常误以为编辑工作主要是文字工作,因而分配担任编辑工作的大多出身于中文专业。这些同志在研究编辑学方面固然有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对于多

数人来说,哲学方法还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还未能把它引进编辑学化为编辑学本身的方法。目前,出身哲学专业又乐于研究编辑学的编辑似乎还不很多。这种情况就使得实现哲学家和编辑学家的联合更加迫切。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呼吁一下:为了使编辑学的研究有一个飞跃,使编辑学从经验形态上升到理论形态,尽快实现编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合。

广学本人既是哲学专业出身,又是一个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的老编辑,既有很高的哲学素养,又有丰富的编辑经验。这种集二者于一身的优势,使他的编辑学研究,既有坚实的基础,又有科学的方法。《编辑通论》对于许多问题的分析和表述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深,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编辑通论》的可贵之处绝不仅限于它对编辑学本身所进行的一系列新有探讨,所引出的一系列的新结论,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们提供的方法论的启迪。从中我们看到许多几乎所有人都谈到但大都没有谈透的编辑学基本问题,也可以看到处处都能表现出的哲学方法的灵活纯熟的运用。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对于编辑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更突出的表现在它的方法上。它标志着我国编辑学研究的理论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它无疑是一部优秀的编辑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应用哲学著作,一部运用哲学于编辑学的著作。我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和一个编辑工作者,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我也相信,凡是认真阅读了这部著作的人都会是很有收益的。

广学 1990 年离开学报岗位。然而,并没有因此而丝毫影响他十分热爱的编辑学研究。相反地倒是使他有可能摆脱众所周知的学报工作者的日常繁务而相对地集中精力思考问题和从事写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把酝酿了 20 多年的思想整理

戒专著贡献给我国的编辑事业,真是值得庆贺。我作为他的朋友,作为一个关心编辑学研究的学报工作者,为他这部新著问世而欢呼。

杨焕章

1994年10月1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序 二

我和蒋广学同志相识,大概是1984年在杭州召开的华东地区文科学报研究会年之后,由于工作的关系,特别是1988年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立以来,接触的机会更多了。

和广学同志十年相处,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可用六个字概括:热心、勤奋、出新。

一个人要真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重要的一点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充满着极大的热心与热情,从感情上热爱自己的工作。广学同志从事编辑工作20年有余,是一位“老学报”了。他一生的黄金时期奉献给学报编辑工作了。他淡泊名利,心无二用,全身心投入编辑工作,对编辑工作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浓厚的兴趣,达到酷爱的地步。他对事业的热心不仅表现在编辑工作上,对担负的其他社会工作,也表现出格外热忱。他一直是江苏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的负责人、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后来担任副会长。研究会的一些大型活动,他竭尽全力准备。会上形成的一些决议和有关问题,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杨焕章教授,大多委托他去起草,往往他要通宵达旦,出色完成。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朝气蓬勃的旺盛活力。他对人对事热情热心,他如一团火,给人以灼热火烫之感。

做编辑工作、从事学术研究,都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必

须有一种甘于寂寞,专心致志,勤奋不止,始终如一,锲而不舍的韧劲和进击精神。广学同志担任南京大学学报的副主任,主持文科学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工作繁忙,任务很重。但他坚持在作好编辑工作的前提下,潜心于学术研究。他研究的领域除哲学外,还有编辑学方面。近十年来,他发表了20篇论文,与别人合著术学著作四部,其中《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管理学》一书,从内容的构思,体裁的安排,文字的润色,他和思伟同志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对学术研究抱有坚定的信心,对其中的艰辛与快慰也有其切身的体验。我很欣赏他如下一段话:“和学术结缘,就意味着嫁给了一座冷漠的、耸入云端的理性之山,须踉跄着一块块牢固的资料岩石用力向上攀登,那越过峡谷、绕过悬崖、跳过陷井而最终登到山顶所留下的轨迹,就形成了你奉献爱情的逻辑证明。”这段形象而包含哲理的话,只有刻苦进行学术研究的人,才能体察其中的真谛与滋味。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发掘,抄袭、模仿,走别人走过的老路,在学术研究上不会有什么作为。大凡学术造诣深、在学术研究上有建树的人,都有一种不同凡俗而善于发现出新的独创精神。广学同志治学上有其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就是善于出新,就是有新观点、新思想、新角度、新语言。他自我评价说:“创造性的工作是我的优点。”“我总是力图在别人说过的话和研究过的问题中,寻找那些必须阐明但又没有阐明的东西。”的确如此,他的一些谈话和论著,常常在朴实无华、富于哲理的语言中闪烁出一股清新、真理的火花,给人以体味无穷的激励与启迪。也许他本人是研究哲学的,在他的编辑学论著中,总是善于从哲学的角度提出问题,从深层次中开掘探索,对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作出理性升华。他提出的关于编辑出版劳

动本质规律,编辑作品的著作权三层分割,文科学报实施法制、科学、人文管理的理论框架等,均是发别人之未发的卓识之见。

在20年的编辑生涯中,广学同志遇到过曲折,有过苦恼,但也有欢乐与快慰。出色的工作成绩、丰硕的研究成果给他带来了愉快。古罗马哲学家克莱修说得好,“世界上所有的愉快没有比攀登于真理的高峰之上,然后俯视来路上的层层迷障、烟雾和曲折更愉快了。”广学同志是会体验到这种愉快的。

广学同志是编辑学研究的热心探索者,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干家。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写出了《编辑通论》,这是他研究心血的结晶。用他给我的信中所的:他是“用心血写书而不是用墨水写书”,他所追求的是“具体经验背后的理性与审美特征……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我个人的烙印。”本书的出版对推动编辑学的研究将产生积极影响,读者会从中得到启发,吸取有益的营养。本书出版之际,广学同志让我写个序。本人才识浅薄,没有资格,本不应听命的。但他的辛勤劳动成果令我感动。兴奋之余,随即写了上述的感想,聊以为序。

宋应离

1994年3月27日于河南大学

叙 志

从1991年8月我就开始了《编辑通论》的写作。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夜思日作，不敢松怠，终于实现了我多年的心愿，将自己20余年的心血交付给广大读者。在它即将送交出版社之际，我心潮翻涌，有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

人生的道路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决定的。我本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祖父是长工，父亲拉板车，在我8岁时母亲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在46年过去之后，现在我居然记不起她的音容声貌来。呜乎，我这个大不孝的东西！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这却是我的肺腑之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她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她和中国人民一起在其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又将我培养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即使她犯下的错误，也为我的成才提供了机会：如果没有五十年代后期逐步抬头的“唯成分论”，我这个小学时没有书，初中时不知钢笔为何物，高中时整天穿着破衣服的乡下穷学生，仅凭自己的学习成绩，怎能考取江苏最高学府——南京大学。所以，自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我就立誓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我为党取得的成绩而自豪，而对地犯下的错误，在我有了清醒的自觉之后，就加入了“自我反思”的行列。1980年，我作为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约孙辉同志写了一篇《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文章，当我提笔修改这篇文章时，想到家乡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而每况愈下的情景，便牵动的我的感情，所以随手改来，而

忘记了客观事物所能容许的界限。到后来竟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我未曾料及的。此事成了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

在自己的感情深深陷入痛苦之中时，我开始对人生的道路进行了哲学的思考。一个决心服务于社会的人，怎样才能得到社会的理解呢？在人不能受到社会理解时，他应该到何处去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呢？结果，我找到了庄子：“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合者谓之天乐。”于是，一种自然主义思潮就流到了我的心灵深处。那时，我和中文系的王继志同志谈得很投机：我们同生在一块乡土，又有相同的文化教养的背景，于是就在这个才思出众的“文学士”的带动之下，开始了文艺创作的生活。我们两人以薛之的笔名，联手发表过三篇小说：《殊途》、《远远》、《魂归》，在马克思“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命题下，把社会也纳入自然系统来认识，表现美在自然、美在和谐的主题，反映在自然与不自然的状态下人的喜怒哀乐。当然，我们讲庄子，都不是为了出世，而是想在入世过程中怎样与社会变得更协调些。所以到后来随着党的政策逐步放开，校党委决定要我主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编辑出版工作，我的心再一次沸腾起来。恰在这时，一批青年作者以清新的精神风貌走进学坛，在天堂和地狱之间他们没有上一代人的那种怯弱，但其中一些人在真谬是非之间，却也没有老一代学者的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所以，在我重新振作精神面视学界的时候，感到一个使命就落在了自己的头上：在向二十一世纪迈进的历史关头，尽一切可能帮助南京大学的这一代学人脚踏实地地走进世界学林。这样我就不能不进行编辑学的研究了。

早在1980年底华东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我

就萌发了研究编辑学的念头。1985年之后在我正式走上编辑学研究的道路后,前后有五位同志对我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复旦大学的王华良和山东大学的刘光裕同志,他们是《编辑论稿》一书的作者,针对我把目光仅仅放在“学报”的狭隘性,便对我讲:学报编辑是一种“非完全形态”的编辑工作,必须把你的研究对象放在“完全的”编辑形态上,要以整个出版活动作为对象去研究;河南大学的宋应离同志,他是《中国大学学报史》的作者,多次对我说:史论结合才是建立中国编辑学的必由之路;中国政法大学的胡梅娜同志,我认识她比较迟,但她的“编辑形式语言论”,启迪我将编辑学与美学相结合;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焕章同志,他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哲学家,虽然进入编辑行当较迟,但他以敏锐的目光考察着和以虚心的态度学习着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的同仁的编辑学研究成果,就编辑学与哲学的关系发表过许多确有见地的论文。他一再说:编辑学必须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不然就不能成为“学”。为此,就必须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分析编辑活动主客体的基本矛盾,揭示编辑活动的矛盾规律。另外,南京师范大学的居思伟教授和杭州大学的方集理教授,他们与我同时走进编辑学研究领域,多年来我们总是携手并进,对我帮助很多。

以上这几位同志,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开掘我的思路。帮助我向编辑学的深处开掘。我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求索于典籍,行走于历史与现实,徘徊在经验与经验背后的彼岸世界之间,玄想着以自己的无限情思摘取天国中的果实。我天生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规规矩矩的工作做不好,但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倒是我的长处。久而久之,我便从朦胧到清醒、从偶发到自觉,居然形成了一个以编辑劳动的本质为“元点”,以历史唯

物主义为指导,以自然主义为中轴,横穿“编辑六艺”的编辑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表明:

编辑劳动是社会化的、扩大了写作劳动形式;其自然主义就是确认:“言为心声”、“心与社会相应”。将此自然主义贯穿于“选题论”中,必然能够得出“补世之缺”、“纠时之偏”是社会精神生产的规律,作为执历史之命的作者与编辑,必须走进历史、认知和感悟历史;以自然主义看待社会的精神消费,其增长必然按层次依次变化,要想创造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选题,作者和编辑应该深入生活,去发现那些“生于大地,起于青萍之末”,而最后必然会“盛怒于土壤之口”、“飞舞于松柏之下”的消费态势。将自然主义贯穿于“审稿论”中,就会看到,历史是判断社会科学学术发现价值的自然尺度,审稿者要想获得历史的眼界,必须进入“观文而识人,知人以论文”的境界,在各种数值指标的对比下,获得判断直觉。将此自然主义贯穿于“编稿论”中必然是顺原稿的自然之理而修瑕,并且在稿内剪裁运化之余,注意在“编体”边缘,以序、按、注、论诸形式,呼风唤雨,在“可立”与“当立”的峡谷中,让天水长流。将此自然主义贯穿于“校对论”,就会根据汉字“依类象形、形声相益”的造字规则,以及同首异身的造词规则、同首异身叠加的造句规则,研究在无意差错的心理背景下,发现“兄弟相混,姐妹错嫁”的差错规律。将其自然主义贯穿于版面与装帧艺术,必然要考虑静态视角艺术规律,力求形神相和,正奇有间。而编辑主体把握编辑规律和艺术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当他由“由之者”到“知之者”、再到“好之者”最后达到“乐之者”的境界后,他就会变成一位艺术高超的钢琴大师,随着社会的脉搏跳动,轻重缓急的跳动着他的指头,奏出

世间最美妙的音乐来。

妄想常常是令人陶醉的。但妄想只是一种幻影,要将它化为现实,不仅要给予它严密的逻辑形式,同时要以切身的经验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造化出一个活生生的理性形象,这样,她才能降临人世。我很羡慕那些在一夜之间就能挥洒万言大作的人,可我由于从小没有很好的文化教养,而在学生生活期间又缺少严格的训练,所以将才、学、识、情集中起来一炉而冶,必须有一段从容不迫地挪动思维脚步和不停顿地积蓄情感甘泉的时间。更何况上述意念在开始阶段还比较模糊,她需要我继续读书、继续思索才能完善起来。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到新的工作岗位对我并不是坏事,在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将人置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领域,我通过阅读作者的书稿和研读古籍结识仰慕已久的先贤,他们能给予我这个乡巴佬以儒者的气质;这里要说的是1990年底的一次体检,发现在我的右肾的上边压着一个“相当大”的异物。在待确诊异物性质的那几天里,我的心非常悲痛。我难过的不是生命就要到了尽头,而是“疾殁世而名不称焉”。名不称,即毫无功德可言。在当立之年,我就把对社会、对家庭该负担的义务一笔勾销,岂不是太无情无义了吗?真是庄子所说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所以那时我计算着如果能够活上三个月、半年、一年应该做些什么事。啊,老天有情当我不死,我原来天生就是一个怪物:我的右腔有两只连体肾,那异物就是已经失去了功能的肾,一次成功的手术,便解决了问题。在我手术后一年,传来了梁振儒病逝的消息。这个虎虎生风的“东北虎”,居然唿啦一声倒下了,这是多么可怕。我更加感到了生命的宝贵和时间的无情。必须抓紧做事,

一刻也不能耽搁。

还在手术后不久,我曾想借给历史系地名学专业开课机会,请傅江同志帮助,以便尽快地把我的构想写成教材。发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的《论编辑出版劳动的本质》,就是本书的绪论之一。振儒的病逝使我产生了加快步伐的念头。然而事与愿违:越是想快思想越集中不起来;在手术后的身体元气尚未复原的情况下,休说才学识情难以结集,就算意念生发,也没有一股气力将几千字的东西一贯到底。这样,我不得不进一步调整自己的步调,从空想回到现实中来。

对于一个为自己设定较为庞大的目标而又奢望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的人来说,他不能不过着双重的生活:一方面,他要苦读深思,同天国中的婵娟“撕混戏逗”,另一方面却要承担起工作单位、家庭、亲友给他的义务。对于我来说,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社会、单位、家庭和亲友们给予我的太多,所以相应地说,我也不能不做些我必须做的事,于是就深深地陷到泥潭之中:运思于“天国”而不得不做“现世”之事时,我常常心不守舍地把事搞得毫无条理,甚至把许多简单的事搞得十分复杂;而带着油盐酱醋离开“现世”之事再进入“天国”时,不但原来走过的路变得混沌不清,就是再开新路时,也往往失去应有的情趣。若不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要我开这门课,我真想将它搁置一段时间。但开课的时间又迫在眉睫,不但不好搁置,相反还要加快速度,这样,我就不能太苛求自己的“婵娟”了:就请你将将就就地降落到世间来吧。

目前我的这本书确实有许多不完美之处:由于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学说等横断学科已走到社会科学领域,我不能

无视它们的存在，但自己对这些新兴学科知之太少，所以只能把浮在表层的知识生搬过来；对于在校对中由汉字、汉词、汉句的构造特征所造成的“无意识差错规律”虽然已被我表述出来，但仍未能给它以完备的语言形式；对版面和装帧的编辑形式问题，我虽然从美学的角度，并以中国乐论的经典观点给予概括，但对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画笔的人来说，语句中毕竟缺少自己的真情实感。不过我并不感到羞愧，它虽是“感时之作”但绝不是“应时之作”，就其主体部分来说，它凝结着我二十余年的心血。因为我承担了撰写《梁启超评传》的任务，我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写好那本书。梁氏是中国近代一骄子，用三年的时间与之朝夕相处，他肯定会帮助我进入新的精神境界。到那时，如果我的身体不出现“差错”，再回过头来修订这本书，肯定会有一个新面目。相信我，亲爱的读者，你们的期待是不会落空的。

满地书刊乱呻吟，
强令指头书寸心，
荧屏已失昨日彩，
不知何年“丝方尽”。

蒋广学

1994年9月15日

于雕胡村神会庐